

軒亮

絕路與活路

中央日報 82.6.14

在中國大陸文革時期，人人一窮二白的吃大鍋飯，在一個小村莊裏有位老太太養了一隻母雞，靠母雞下蛋可以有一點額外的收入，所以她也加意的照顧那隻母雞，定時餵食，每到黃昏又把母雞關進籠子，以免成爲黃鼠狼的點心。老太太養隻母雞，看在公社中其他人眼中竟不是滋味，終於有人在集會中舉發，指責她不該浪費糧食養雞，不管雞吃的是她自己省下的還是公家的。最後

議決：母雞沒收，明天燉雞湯大家加菜。

第二天大家正在享受雞湯的時候，發現老太太不見了，左找右找，最後發現她在附近樹林子裏上吊自殺了。

這是數不清的「文革故事」中之一件，給人第一個反應便是太不值得了，許多人沒有養雞，不也是一樣的過日子，何致於尋死，賣雞蛋又得到幾文錢？能買什麼東西，老太太似乎太愚昧了些。

這個故事也可以讓人想到此地曾經有過的一點學生生活經驗：

三十年前，高中男孩上學時要穿制服，帶一頂軍帽。這頂帽子從高一開始就由學校代辦購買，一戴三年。有意思的是領到軍帽的第一天，就有不少男孩把那頂帽子又捏又壓，總要弄出個不怎麼標準的形狀。家境較好的同學，乾脆棄而不用，另外到「兄弟帽廠」去訂製一頂納粹黨那種前面高高翹起來，窄窄的帽沿又低低遮住眼睛的帽子，也有人特別多鑲一圈絲邊，裏面還用真皮襯墊。

帽子上做過那麼多手脚，看起來又如何？外人眼中根本不介意，也看不出有何不同，一如那位養了一隻母雞的老太太，就算仔細的觀察，也不會跟公社裏的其他人有何殊異之處。可是從文革時期的老太太到我們這兒三十年前的高中男孩，都有一個共同之處，那就是他們都在追求跟別人的一點不同，別人看得出不倒在其次，對自己倒是非常重要。這個道理到今天還是說得通的，不

論是社會主義還是基本主義社會。

可是我們仍然覺得爲一隻母雞尋死，爲一頂帽子耿耿於懷，也過分小題大作了。那我們就要從社會背景來看過這個問題。文革時期的大陸社會，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非常小，衣食住行種種都在整齊劃一的標準中，有沒有一隻母雞，就特別的突出了重要性，在那個環境裏，比別人多一隻母雞，多的不只是雞蛋，還有標幟出一「財富」與「成就」的寄託，母雞沒有了，生活的重心就此失落，這與一個人雖然只是個小小公務員，一朝退休，頓失生活重心，在原理上殊無二致。當年的高中生受到的管束甚嚴，因此他們便搞一些可能的不同，帽子怪一點，頭髮長一點，扣子少扣一個，走路駝一點、書包揹帶拉得長一點等等。這一點點的不同，可以滿足在強制體制下的空悶感。人，的確需要一點獨立自主才能活得充實些。

今天的高中學生或許對這些小小的一點點不那麼在意了，今天的大陸也不致於再有人爲一隻母雞上吊的了，那是因爲他們都有了更開展的生活空間，不必再從瑣細事物中肯定自我。他們可以從讀書、運動、創作、交友、遊戲、以及各種無人可以干預的嗜好中得到心理的補償，我們可以爲了如此的進步而慶幸。

前幾天讀到一篇報導，提到北大一位教授因職稱而發瘋。另一位副教授因眼

看當年的同學升為教授，痛苦不堪而上吊自殺。這種事情在臺灣不太可能發生，因為副教授、教授等等的差距，已經不會在我們大學教師心目中成為生死交關無可取代的標幟，便是多出來的津貼，大部分的人也覺得無足輕重。我們這裏肯定生活及生命價值的籌碼，顯然的比大陸要多，相對的使得許多名份、實質等的比重減輕不少，這樣的生命當然是比較開闊的。

但也未必人人生活在開闊的社會環境中都一定有開闊的胸懷。制度比我們更完備，也更富裕的社會，還是可能會有「為一隻老母雞」而上吊的人。情人去了、被炒魷魚了、落榜了、破產了、曾經做過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曝光了、被人羞辱了：：，都可能讓有的人鑽牛角尖的走上絕路，這種人，死得比那位老太太或是那一、兩位大學的教師還不值得。人家還的確由於籌碼太少而不開，我們這樣的社會中若是想不開，那是無數條活路好路當前，自己竟視而不見，這可真應了自尋絕路的一句話。

在中國大陸文革的噩夢過去之後，我

們也陸續發現有無數的人還是持續的磨練他們自己，那十年的災禍並沒有打倒他們，他們更堅強、覺悟得更透澈，現在的表現更令人敬重。許多曾經或者現在到臺灣的傑出人物都是證據，在大陸還有更多的證據。這不免又讓人聯想到被拘禁在集中營裏的史懷哲，可以藉雙手在粗笨的木桌上以想像配合動作彈奏管風琴。難怪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打倒史懷哲。大陸有很多在極為專制的政權下還是無法打倒的人，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生命中該有什麼籌碼，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的方式承受了腥風血雨的歲月。

可見生命的韌性也像某些生命的柔弱一樣，都超過我們一般的經驗與判斷。外在的困頓或是豐盈，都不是一個人活不活得下去主要的原因。我們只能說，在苦難中的人需要更高的韌性與智慧才能磨練出對生命的肯定，而在安逸開放的社會中，還是左支右絀的想不開的話，只能怪自己的頑固與閉塞了。我真的相信，在某些狀況中，所謂的痛苦，不過是另一種陷溺而已。